

福建叢書 第二輯之四

福建省文史研究館選編

居業堂詩稿 (一)



福建叢書 第二輯之四

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編

清·李馥著

居業堂詩集（二）

江蘇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居業堂詩稿／(清)李馥著. -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2000.11
(福建叢書, 四. 第二輯)
ISBN 7-80643-426-7
I. 居… II. 李… III. 詩歌 - 作品集 - 中國 - 清代 IV. I222.7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74998 號

《福建叢書》編委會

主 編:陳 虹

副主編:余險峰 歐孟秋

編 委:(以姓氏筆劃為序)

方寶川 任仲泉 李瑞良 林 列 陳慶元 郭天沅

趙玉林 鄭壽巖 廖宗剛 廖楚強 謝水順

編輯策劃:廣陵書社

書 名:居業堂詩稿

作 者:清 李 馥 著

出版發行: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號)

經 銷:廣陵書社

(揚州市鳳凰橋街 24-6 號)

印 刷:金壇市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開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張:43

版 次:2000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

印 數:1-250 冊

定 價:190.00 元

ISBN 7-80643-426-7/Z·36

《福建叢書》第二輯編印說明

《福建叢書》是福建省文史研究館以搶救、保存、整理具有較高學術研究價值的閩人著述和閩事文獻為宗旨而彙編的。自一九九三年開始，陸續出版了明代晉江何喬遠《名山藏》、福清葉向高《蒼霞草全集》、閩縣陳珩《大江集》和《大江草堂二集》、晉江楊道賓《揚文恪公文集》、晉江李光繕《景壁集》、晉江黃克纘《數馬集》、閩縣周之夔《弃草集》、莆田黃鞏《黃忠裕公集》、侯官韓錫《榕庵集》及永安羅明祖《羅紋山全集》等十種，保存了晚明大量珍貴史料；由於選自稀本珍本，整版精良，更具有版本價值。發行後引起國內外文化界、學術界、出版界的重視，并為美國、日本等國國家圖書館所收藏。一九九六年全國文史研究館成果展覽上，頗獲嘉譽。

鑒于手稿一旦散失即無法補救，叢書第二輯以搶救出版有價值的閩人著述和閩事文獻的手稿（包括精鈔稀本）為對象，時限不受限制，著者不限閩人，凡符合叢書編印宗旨的，今後陸續推出。

第二輯若干卷，其版本裝璜與第一輯保持一致。經勘實，字迹端正者予以影印；其不適影印者則采用現行標點符號點校排印。所有勘校文字附于卷末，以保持原稿的真實。

古籍手稿至夥，編輯聞知有限，至祈海内外文史同仁贊襄，推薦書目。并歡迎對叢書的編印出版惠賜寶貴意見，俾叢書益臻完善。

李馥及其《居業堂詩稿》考論

方寶川

李馥是清代康熙年間的一位地方官員。他勤政報國，清廉愛民，身着官服，心羨布衣；酷愛藏書，孜孜為學；一生飄泊，暮年淒楚。所著《居業堂詩稿》（以下簡稱《詩稿》），是其現存唯見的一部作品，既有文獻價值，又具史料價值。

一、李馥的生平事迹

據筆者知見，最早記載李馥生平事迹的典籍是清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纂修的《福州府志》。該志卷五十七《人物列傳》稱：

李馥，字汝嘉。福清人。康熙甲子舉人。任工部員外，轉刑部郎中。以治九門提督陶和器獄有聲，出守重慶郡。經流寇亂後，田賦無考。馥履畝清丈，侵占弊息。遷河東運使，調蘇松常鎮道，晉江蘇按察。制府擒治奸民，株連百餘人。馥察其冤濫者，盡白釋之。轉安徽布政，巡撫浙江。時亢旱，請截漕二十萬，民不知饑。又，漕米例用白糧。馥疏請兼用紅白，民便之。以失糾屬員去任。馥家素封，義所得為，必勇為之。在官以廉慎稱。家遂中落，歸田二十年。借屋以栖，怡然自樂。與士大夫文酒還往，年八十餘，重宴鹿鳴。又數年

卒。

此後，清道光九年（一八二九）陳壽祺等纂修的《重纂福建通志》、道光年間郭柏蒼撰寫的《竹間十日話》和《烏石山志·翠岩廢寺記》、光緒《重修安徽通志》、民國《浙江通志》以及民國《福建府志》等地方文獻，均載有李馥的生平史料。比較所載，基本上都是沿用了《福州府志》的說法。所異或補充之處，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重纂福建通志》卷二二六載：「……(李馥)與福州知府顧焯倡平遠詩社，文酒往還，怡然自樂。好藏書，多善本。重宴鹿鳴，年八十四卒。」

(二)《烏石山志》卷三《寺觀·翠岩廢寺記》曰：「……康熙四十二、三年間，福州郡守顧焯與侯官諸生林衡倡立詩壇，招都督李涵……李馥等四十餘人，結社於九仙山平遠臺，即所謂平遠社也。乾隆甲子，鹿山年八十四，重宴鹿鳴。其居宅為敬業堂，在福州黃巷，與里社南北相向。」

(三)《重修安徽通志》卷一二五《職官》云：「李馥……康熙五十九年，安徽布政使。」

(四)《浙江通志》卷一二一《職官》稱：「李馥……(康熙)六十一年以安徽布政使升任。」

顯而易見，上引地方文獻所載的李馥生平資料，或語焉不詳，或互有所乖，故可

商榷之處，在所難免。茲主要根據李馥所著的《詩稿》，並結合、比較上引史料，將李馥的生平事迹訂補如下：

李馥，字汝嘉，號鹿山，別號信天居士^(一)。福建福清人。據《詩稿》壬子《生日》詩稱：「小陽十二我生辰，六十七年際盛春。」小陽又稱小陽春，即農曆十月。「壬子」指雍正十年（一七三二），是年李馥虛歲六十七。據以上推算，他當生於清康熙五年（一六六六）。其父早亡，由母親撫養成人。康熙二十三年舉人。二十五年成婚。四十二年，與福州郡守顧焯等人在九仙山（今福州于山）平遠臺共創平遠詩社。四十四年，遵母命北上。次年，在京會試，不第^(二)。作《丙戌榜發後口占》嘆曰：「可憐盼斷閨中眼，正是長安落第時。」後經人推薦，在京官工部員外郎。四十八年，轉刑部郎中。次年，出知重慶。據《詩稿》壬辰《宿桺木鎮》詩自注云：「時予初莅任，上省謁見大吏。桺木鎮主人曹春沉冤三年，予察而白之，因以香火祀於堂中。」《福州府志》等均將此事誤記爲李馥在江蘇按察使任上。李馥在蜀爲官三年，任滿有政聲。五十二年，其妻病逝福州，李馥悲痛欲絕。應召赴陝西，經山西、河北，再次進京。五十五年，遷河東運使。是年逢亢旱，民無以食。他勤政恤民，請截漕二十萬，民不知饑。第二年，他作《喜雨》詩提及此事時曰：「去年旱乾葉枯槁，觸目嗷嗷哀殘黎。漕留廿萬億兆活，九重宵旰憂民饑^(三)。」《福州府志》等亦將此事誤記爲

李馥巡撫浙江之時。李馥在江蘇任職不滿三年，其間曾調升蘇松常鎮道，江蘇按察使。五十七年，又奉旨入都。五十九年，任安徽布政使。依然體恤民情，憂民所憂。曾發出「田荒民力殫，徵斂使人愁」之嘆^(四)。六十一年，又升任浙江巡撫。方上任，洪災泛濫。他盡心盡責，抗洪救灾。有《癸卯》奉命相視海塘》和《《癸卯》奉命勘海門》等詩作記其事。雍正二年（一七二四），被謗罷官，削迹入獄。次年，在獄中寫了《獨夜》、《感懷》、《予以罪幽繫，獄吏樹一桃於檻前，觸目興感》、《獄中》、《雨後》等詩作，道盡了獄中罹難之苦。如：「土室沉沉晝亦昏，微軀瑟縮學鴟蹲^(五)。」「誰憐窟室衾綢冷，自是男兒性命輕^(六)。」等等。不久出獄，一直蜗居蘇、杭，十餘年沒能回鄉。晚年孤苦伶仃，悲涼淒楚，終日讀書消愁，觸事興懷，撫琴泣聲，苦度殘生，并非如《福州府志》等所說的「怡然自樂」。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值其鄉試中式六十年後，再遇是科鄉試，經奏准重赴鹿鳴筵宴。乾隆十四年，年八十四卒。

二、《詩稿》清稿本的流傳及其文獻價值

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藏《詩稿》（以下簡稱「師大本」），係清抄稿本，凡六冊。除第六冊「乙卯年」部分版高二十二厘米、寬三十五厘米，每半頁八行，行十五字外，其餘各冊皆版高二十二點五厘米，寬三十五厘米，每半頁九行，行十六字。六冊均小字雙行，細黑口，四周雙邊。字精行疏，銀鉤銑刻。全書不分卷，詩作系年編排。每

年之始，卷端均題有「居業堂詩稿」和該年的干支年份。「師大本」未署作者姓名。據已故福建師大圖書館館長金雲銘教授說：「此本舊存李作梅處，有其存書印。解放後始流出一部分。入鄭麗生手。另部分則存於林汾貽處^七。」現「師大本」康熙戊子年詩作之前，附有已故鄭麗生先生題記一篇，曰：「此鈔本極精，存戊子（康熙四十七年）、乙丑（四十八年）、庚寅（四十九年）一冊，甲午（五十三年）、乙未（五十四年）、丙申（五十五年）、丁酉（五十六年）一冊，壬寅（六十一年）、癸卯（雍正元年）一冊，丁未（五年）、戊申（六年）一冊。」此正是鄭麗生先生當年所藏的部分。而現存「師大本」則多出了「甲申（康熙四十三年）、乙丑（四十四年）、丙戌（四十五年）、辛卯（五十年）、壬辰（五十一年）、癸巳（五十二年）、戊戌（五十七年）、己亥（五十八年）、庚子（五十九年）、辛丑（六十年）、甲辰（雍正二年）、乙巳（三年）、丙午（四年）、壬子（十年）、癸丑（十一年）、甲寅（十二年）、乙卯（十三年）」等十七年的詩作，當即林汾贈先生原藏的另一部分。鄭、林所藏合歸師大館後，經重新整理裝訂為六冊。現「師大本」全書起於康熙甲申年（一七〇四），迄於雍正乙卯年（一七三五），其中尚缺康熙丁亥（一七〇七）和雍正己酉（一七二九）、庚戌（一七三〇）、辛亥（一七三一）等四个年份。因原書殘本未署作者姓名，故該詩稿為誰所作，曾成為一大問題。鄭麗生先生根據《詩稿》中的「醜也性嬾拙」詩句，認為此集「為鹿山集無疑」。又據「老翻

曆日多增感』中的『曆』字，無避諱缺筆，推證此稿「是乾隆以前寫本也〔八〕。」後金雲銘教授也在鄭麗生考證的基礎上，再以李馥的生平及交游情況，與《詩稿》的部分詩作相印證，也得出了「此集為李馥所著，迨無疑義。」的結論〔九〕。前些年，福建師大圖書館古籍部同仁林娜又作《抄本〈居業堂詩稿〉作者述考》〔一〇〕，更是全面考證了《詩稿》為李馥所作等問題。有幸的是，此次我們在研究整理出版該書時，又意外地發現了福建省圖書館尚殘存一冊清稿本（以下簡稱「省館本」），其版式、行款、字迹、紙質等與『師大本』均相同，可確認為同時之物。該冊收錄了雍正庚戌（八年）、辛亥（九年）、壬子（十年）的詩作，并於「壬子年」的卷末，署有「福清李馥著」五字。至此，該書的作者問題已完全定論了。另外，該冊收錄的三年，雖然其中的「壬子」年「師大本」也有，但詩作無一重復。因此，此三年詩作均可補「師大本」之缺。若從上述情況推考，該冊很可能是作者當年整理詩作殘稿時，又找到的部分詩稿而另外抄清的。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該冊同「師大本」一樣，曾經同為李作梅所藏。因為該冊的「壬子」年卷端鈐有與「師大本」完全相同的「李作梅」和「向穠守之」這兩枚收藏章。

現存的《詩稿》清稿本中，鈐有許多藏書印章。這些印章對我們考訂該書的流傳軌迹，鑒定該書的文獻價值，頗具參考意義。例如：康熙甲申年卷端有「鹿山李

馥』、『信天居士』二方印章。雍正戊申年卷端有『居業堂』一印，可見該清稿有李馥自著印記，而康熙乙酉年卷端所鈐的『過眼雲烟』、戊子年卷端的『不貪珍寶』、庚寅年卷端的『生事不自謀』、卷末的『舍書百不欲』、丙申年卷端的『書魔惑』、雍正癸卯年卷端的『官貧心甚安』、丙午年卷末的『見客惟求轉借書』等印記，體現了李馥畢生藏書的心迹，并與其性情、趨向相印證。而康熙庚子年卷端鈐有『福清李二使』一印，康熙甲申、癸巳、庚子，雍正乙巳、庚戌、壬子年等卷端所鈐的『李作梅』和『向穠守之』兩印，則說明了此詩稿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為福清李氏所藏，解放後纔散出。

據筆者知見，現存《詩稿》除了『師大本』六冊和『省館本』一冊之外，尚未有其它的刊本及完整的傳抄本，已幾為廣陵散絕矣。已故金館長在搜得該書殘本時，曾慨嘆：『其中所缺之卷，當續訪得之，庶成完璧耳（一）！』今雖又覓得『省館本』一冊，但遺憾的是仍未能合為完本，且『師大本』之中『康熙癸巳年』詩作，尚有二十一頁殘缺不全。為了搶救這一珍稀典籍，目前也只好先本着雖殘必珍的原則，將『師大本』和『省館本』合編影印出版，不知將來還能促成完璧否？

三、《詩稿》的主要內容及其史料價值

《尚書·舜典》曰：『詩言志』。在心為志，發言為詩。長期以來，中國大多數的詩人都是遵循這種詩歌創作的原則，作詩言志，歌咏抒懷。李馥也不例外。現存

《詩稿》收錄了作者三十年間的詩作，凡一千四百餘首，其內容十分豐富。除了上述已提及的可訂補作者生平事迹的詩作之外，還有很多部分比較真實全面地反映了作者從政期間及罷黜之後的思想情趣、悲歡離合及各種矛盾複雜的心態。具體可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 勤政報國，清廉愛民。

勤政報國，清廉愛民，是中國封建社會部分清官的爲官之本。由上得知，李馥在知重慶，官河東運使、蘇松常鎮道、江蘇按察使以及任安徽布政使、浙江巡撫期間，均有善政。《詩稿》中對此反映頗多。例如：他出知重慶時，有《（辛卯）寄林松址》詩云：「但使庶民足，寧愁三徑荒。」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重慶大旱，他在《（壬辰）禱雨》詩中曰：「渝城經月旱，萬姓已嗷嗷。獲罪惟予輩，降殃及爾曹。」爲了減輕民衆的疾苦，如此憂心忡忡，且大有獻身之精神。五十二年，他妻子病逝，在極度的悲傷之中，他仍然念念不忘「微軀既許國，家事豈復牽」的抱負。五十五年，他被九卿一致推薦爲河東運使。雖然自己「已慣囊空貧到骨」，但是，上任之際首先考慮的仍是「財賦東南民力盡，此行何以慰姑蘇」。^{〔一〕}緊接着他又作《述懷六十韵》：「歷數除官日，長懷報政時。」「勢重千鈞壓，力微一柱支。」「微軀已許國，矢志敢營私？」^{〔二〕}窮通隨氣數，政事慎敷施。^{〔三〕}云云，表示了自己要不負衆望和不遺餘力

的決心。五十九年，當他升任安徽布政，在江蘇與各同仁告別之時，作《晤武進宜令、宜興魏令、江陰葉令、靖江鄭令，出此示之》詩，總結了自己仕宦十六年來的經驗和根本：「爲政無多術，愛民如愛身。徵徭疲悉索，囊橐守清貧。楓陛勤求莫，茅檐待至仁。勵哉常軫念，召杜彼何人。」通過這些詩句，就能很清楚地看出李馥的勤政報國之志，清廉愛民之舉。

(二) 身着官服，心羨布衣。

身着官服，心羨布衣，又是中國封建社會部分清官的共同心態。他們一方面試圖藉爲官之便體恤民情，圖報國家；另一方面，又看透官場腐敗，宦途艱險，渴望歸隱。李馥也有這種爲官的心態，并屢見吟咏。例如：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二），他早在重慶爲官時，就自畫《漱石枕流圖》，并題詩曰：「四十年來鬢有華，枕流漱石是生涯。松間嘯傲甘肥遯，渴飲饑餐看流霞」^(五)。追求的是如此一種悠閑的生活。五十六年他作《(丁酉)有感》詩又說：「柄止何妨篷船窄，奔馳徒羨布衣尊。枕流漱石何年遂，閑看溪雲半吐吞。」可見他多年來還一直在向往這種悠閑的布衣生活，并慨嘆何年纔能實現枕流漱石、退隱山林。五十七年，他的江蘇按察使任滿，在奉旨入都的途中，已知道自己將再次被提升，却唱出「悔不爲農鄉井畔，長供甘旨侍庭闈」^(六)的心聲。後又作《(戊戌)用韵和遂山壁問作》曰：「何時得遂烟霞癖，擬住溪邊老一

竿。』六十年，他在安徽布政使任上，又想致仕還鄉，於《（辛丑）退居》詩云：「宦情冷淡安吾分，數畝荒田手自鋤。」雍正元年（一七二三），他任浙江巡撫。就在他官場得意仕途最高峰之時，還是念念不忘「誤盡浮名君識否？余生何日遂初衣。……顯揚自昔指高官，及至成名進退難〔一七〕」。

雍正二年，他萬萬沒有想到被誣罷官。入獄期間，他遭受了各種凌辱，身心慘痛，對官場的腐敗與黑暗，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他後悔自己沒有及時下決心隱退辭官，於是發自內心的寫出了「廿載困風塵，休官作幸人〔一八〕。」「簪纓從古皆身累，懺向空王悔已遲〔一九〕。」以及「宦途纏縛同蠶繭〔二〇〕」等詩句。並且還告誡兒子：「衰遲悔憶從前錯，汝輩應須鑒乃翁〔二一〕。」希望兒子們不要重蹈他的覆轍。

（三）酷愛藏書，孜孜爲學。

李馥酷愛藏書，是清代福建一大藏書家。其藏書的經歷和情懷，亦可從《詩稿》中窺得一斑。例如：從《（丙申）答陳次廬吳少文》詩：「書還藏得三千卷，田不須謀二頃良。」可得知當時他的所藏已頗具規模，且視藏書重於田產。古人常稱嗜書入迷者爲「書淫」，李馥也自稱「性無他癖只書淫〔二二〕。」他被罷官之後，更是「事少長閑坐，舟輕只載書〔二三〕。」後因生計所迫，無可奈何，只好「典鬻到琴書，頽敗忝禰祖〔二四〕。」其藏書開始逐步散出。到了雍正六年（一七二九），已是「插架圖書都向盡〔二五〕」

的境況了，留下的只是一小部分隨身常讀的書籍。盡管如此，他還是視書如命。他《（辛亥）自嘲》詩曰：「草滿窗中總不除，囊空抵死欲營書。斯文結習難消化，多恐前身是蠹魚。」《（乙卯）自訟》詩又云：「塵心時自訟，習氣未全除。布地搜奇卉，逢人借異書。」看來，他真是到了「老更滯書淫〔二六〕」的地步了。因此，他七十歲之時，依然還是「琴書四壁靜相依〔二七〕」。

古代藏書家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為藏書而藏書，即所謂「浮慕時名，徒為架上觀美〔二八〕」，或「廣收遠括，畢盡心力，但圖多蓄〔二九〕」者；二是為讀書而藏書。李馥藏書，也是為了讀書而藏。他早年在京做官，就自稱：「平生百不能，詩書志所向。……兀坐斗室中。圖史恣醞釀〔三〇〕。」「三冬吟不輟，五夜手休停〔三一〕。」長期以來，勤政之餘，一直孜孜為學。罷官之後，寄居東吳，貧病交加，依然「久病疑方藥，衰年喜讀書〔三二〕。」「白首窮彌堅，青燈老終矢〔三三〕。」尤其令人感佩的是，他在「膏缺妨夜讀，竈冷乏晨吹〔三四〕」的處境中，還能堅持「閱世冷看三尺劍，齋心靜對一床書〔三五〕」。他仕途坎坷，被謗罹難，但他認為「困窮豈盡詩書誤，志節寧因放逐移〔三六〕」。因此，他決心「讀書伴老送生涯〔三七〕。」終日「殘書重整不發塵，開卷追尋意義新〔三八〕。」「俯仰探古今，惟恐有遺逸。左右列圖書，藥石砭衰疾〔三九〕。」真可謂兀兀窮年，學而不厭。

李馥藏書除了自學之外，尚「留書爲教子」^(四〇)。他雖然不願意兒子再走他學而爲仕的道路，但是他認爲：「人生不讀書，衣冠而木偶」^(四一)。所以他要求兒子們「慎勿騁紛華，精勤採二酉」^(四二)，只有「圖史羅胸中」^(四三)，纔能「疑義一一剖」^(四四)。因而，他課子甚嚴，經常「爲語兒曹勤課誦，希賢總在古人書」^(四五)。「課子長吟誦，永日手一編」^(四五)。

（四）一生飄泊，暮年淒楚。

李馥的一生，曾「十載官燕蜀」^(四七)，又先後在江蘇、安徽、浙江等地爲官十餘年。二十多年的孤身游宦，他自己的感覺是：「廿載飄零類斷蓬，無邊心事更誰同」^(四八)？這期間，他又一直在求仕和退隱兩途彷徨無主，因此他的思鄉情懷，經常觸而興之，溢於楮墨，寫了許多此類的詩句。例如：「思鄉悵望獨躊躇，不盡愁懷一紙書」^(四九)。「詩句偏從枕上得，鄉心先向夢中歸」^(五〇)。「轉輾不成眠，鄉思中夜起」^(五一)。「宵深雨雪眠難穩，路隔鄉關夢不通」^(五一)。「鄉國何年歸聚首，一樽堂上坐團圓」^(五三)等等。他被罷官之後，思鄉之情更爲濃烈。但是，他還一直蜗居蘇杭，「白首猶爲客，愁心只自憐……匆匆春又暮，未敢計歸年」^(五四)。「羊腸歷盡已知非，歲歲思歸未得歸」^(五四)。他之所以「未敢計歸年」，就已知的材料分析，其原因有二：一是他爲官清廉，罷官之後，家無寸田。即他在《丙午秋懷》詩所說的：「豈不懷故鄉，故鄉無